

□数量经济理论及应用

中国城镇居民间歇式周期性波动的消费行为

金晓彤, 蔡玉程, 董直庆

(吉林大学 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西方传统消费行为理论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经济转轨期居民消费行为。我们研究了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相关性,提出了中国经济转轨期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假说”,并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所提出的“假说”进行了实态验证,印证了居民消费行为“假说”的真实性。得出的基本结论为:中国居民是基于传统消费文化来安排消费的,这种传统文化在动态变化的体制变迁中铸就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呈现典型的间歇式周期性波动特征。

【关键词】城镇居民;消费行为;间歇式周期性波动;传统消费文化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7)06-0121-05

【收稿日期】2006-1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BJY047)

【作者简介】金晓彤(1964-),女,回族,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西方学者消费行为理论在我国的应用状况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整个国民经济在支撑其发展的三个“轮子”——投资、内需和外贸的拉动下呈现出有序、平稳的发展态势。然而,进入“九五”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居民消费行为却呈现某种程度的“悖逆”现象。一方面,经济平稳增长,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居民消费规模却增长迟缓,甚至表现为负增长。据统计,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从1991年到2005年分别为60.8%、59.9%、58.3%、57.3%、57.5%、58.9%、58.5%、58.7%、60.3%、61.3%、59.8%、58.2%、57%、55.4%和52.1%^①。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居民的最终消费率均在70%以上。^{[1]31}相比之下,我国与钱纳里的这一标准模式相去甚远,就连储蓄率很高的东亚国家也在65%以上。^{[1]135}那么,为什么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居民的消费行为会有悖于经济增长的趋势呢?这种现象是偶然的,还是带有某种必然性呢?针对这一现象,国内学者借鉴国外的消费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试图用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给出合适的判断,但结果并不理想,尤其是转轨期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解释力略显不足。究其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6年)相关数据计算。

原因在于缺乏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分析，而仅仅以数据拟合优度为标准。事实上，西方学者的消费行为理论是根植于当代西方社会制度、经济组织等土壤之中的，而中国的国情同西方社会相去甚远，西方学者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即使能够解释或作局部解释，往往也是局限于表面，而非本质性的阐释。

西方消费行为理论大多只强调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但事实上收入仅是消费的必要条件，最根本的还是消费动机——即居民消费行为是在消费动机的驱使下产生的，而动机之强弱不仅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些社会因素包括经济制度与经济组织、社会习俗（由种族、教育背景、宗教信仰和社会道德观念等因素形成的习惯）、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希望、社会财富分配的“游戏规则”等等。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会导致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居民的消费行为大相径庭。可见，透视居民消费动机之形成，才能对居民的消费行为给出完全的解释。然而，西方的消费行为理论都是在假设社会制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展开分析和讨论的，即社会相对稳定，不存在重大的社会变革。这一理论形成的前提条件与我国的现实情况差异较大，我国目前还处于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确切地说，是处于经济转轨的后期，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居民消费动机的产生背景不是相对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学者的消费行为理论难于透彻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原因。

另外，由于我国官方统计中存在客观因素和人为因素所致的遗漏与误差。因此学者们在对居民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时，必然重新估计或修正有关数据，而这种估计与修正是否科学、合理还是一个“未知数”，这样，同一经济变量的估计值就会因人而异，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加之我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经济体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居民的消费动机和消费行为受之影响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就会造成转轨时期的数据在时序上的可比性差，加大数据处理的困难和误差。因此，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仅以数据的表面处理为准，而忽视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由此看来，对于转轨时期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从理论与实证的双重视点上给出全面的诠释是十分必要的。

二、中国城镇居民间歇式周期性波动消费行为假说的提出

既然西方学者消费行为假定在解释我国居民消费行为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们有必要立足于中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现实，从新的角度去探讨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特征，解析转轨经济中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之谜。为了对转轨期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作出完整的诠释，这里笔者拟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提出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假说。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中日益融入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许多成份，然而与西方人的消费行为相比，中国居民的消费有着特有的规律。下面的基本假设符合转轨期的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表象：

假设1 一般来说，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其消费的水平是与其收入的高低成正比的。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相应地，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假设2 中国居民并非按西方消费经济理论所假定的人们是按终生来安排自己的消费，追求一生效用的最大化，而是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一般都存在一个特定的消费高峰，于是人们在每个阶段都要为应付相应的支出高峰来安排自己的储蓄与消费。在人们的一生中，有若干个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大事”，需要用特别的消费方式作特别处理。这些“大事”包括结婚、置家、子女教育、防病、养老等。为了这些必须支付的成本，人们必须做出阶段性安排。

假设3 家庭消费以量入为出为宗旨，尽量不从外借钱。“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被推崇为

优良的家庭消费文化。当西方人早已习惯于“透支消费”时，绝大多数中国居民仍然原地踏步于“封闭预算约束”状态。

假设4 在面临收入约束和信贷约束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消费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基本消费（ C_1 ）和额外消费（ C_2 ）。基本消费和额外消费分别是指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和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一般来说，消费者总是在满足基本消费之后，才能决定剩下那部分收入在现期的非基本消费与储蓄之间如何进行分配。基本消费通常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额外消费的部分则表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性。但为了满足结婚、置家、子女教育、子女婚育、防病、养老等项必不可少的额外消费支出，大多数家庭都在日常的消费中奉行着“节支”的原则，而进行一定数量的储蓄，以应付消费高峰时的大笔支出。因此，居民消费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这种周期性可表示为储蓄——消费——再储蓄——再消费的循环过程。

假设5 典型消费者是理性的并且普遍是厌恶风险的。作为理性消费者，他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合理安排现期收入，力求做到将所有的收入与财富在有生之年的不同阶段消费（包括消费高峰的消费），以获得各时期总效用的最大化。作为风险厌恶者，他的消费与储蓄决策是在风险与收益的比较基础上进行的，当收益率相同时，消费者总是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储蓄资产；当风险相同时，消费者总是倾向于选择收益率较高者；处于体制变迁中的中国居民在安排消费时需要考虑的支出项目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明显增多。当原来的住房、医疗、养老等由政府“大包大揽”变为由居民自己、单位和政府共同承担或由居民独自承担时，他们必须为这些项目的未来支出提前做出恰当的安排。

基于上述基本假设的消费前提限制，本文提出中国转轨期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假说——由固有文化产生而在动态变化的社会经济中促成的居民间歇式周期性波动的消费安排。

中国居民不会像“社保”健全的西方社会那样靠消费信贷提前满足消费需要，而是从有独立收入开始就按阶段安排自己一生的消费。依据以上假设，可将一般中国居民的消费安排分为若干阶段，这里用 $S_1 S_2 S_3 \dots S_N$ 表示不同的人生阶段：

第一阶段（ S_1 ）。在此阶段，除了一部分思想前卫的年轻人进行近乎挥霍性的、潇洒消费外，大多数人要为筹划婚事、置办高档家俱而储蓄，因此，这一阶段表现为储蓄 > 收入。从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来看，通常表现为消费 < 收入。

第二阶段（ S_2 ）。在这一阶段，年轻人经过几年的工作，大多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龄段，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而思前想后、精心策划。为了这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他们宁愿借债（内债与外债）也要将婚事办得体面。所以，这一阶段，通常表现为消费 > 收入。

第三阶段（ S_3 ）。 S_2 阶段可以看成是人生消费中的第一次消费高峰。高峰过后，人们便开始为下一个消费高峰而筹划，即为购大房子或购车而储蓄，这笔开支大概可算作人生中最大的一笔开支，通常要经历较长时间的积蓄过程。因此，这一阶段表现为消费 < 收入。

第四阶段（ S_4 ）。经过一段时间（ S_3 阶段）的积累，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购买大房子和购车成为人们的现实需求时，这便构成了人生中第二次消费高峰，并且这一次的消费支出是人生中支出最高的一次。于是，这一阶段必然表现为消费 > 收入。

第五阶段（ S_5 ）。当人们经历了两次消费高峰之后，孩子的教育投资被提到议事日程，有的甚至在此之前就开始考虑孩子教育投资的问题了。于是人们又一次进入了消费 < 收入的阶段。

第六阶段（ S_6 ）。孩子教育投资可以划分为若干笔支出，即小学、中学、大学以及特殊能力的培养。中国毕竟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父母可以放弃一切非基本消费，但对教育的投资决不放弃。因此，处于这一阶段上的家庭消费支出通常表现为消费 > 收入。

第七阶段（ S_7 ）。这一阶段是人们即将走入职业生涯的终止阶段，这时的人们往往要为自己的养老、医疗问题积攒一笔可观的资金；同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父母不仅要为儿女养大

成人,而且还要为子女的终生大事积蓄一笔资金。因此,这一阶段可能是人生中储蓄最高的阶段,储蓄与收入的关系也自然表现为储蓄>收入。从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来看,通常表现为消费<收入。

第八阶段(S_8)。这一阶段是人们开始进入退休生活,除基本消费之外,额外消费相对较少,人们的退休金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外,几乎全部用于储蓄。从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来看,通常表现为消费<收入。

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居民是基于传统消费文化来安排消费的,这种传统文化在动态变化的体制变迁中铸就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呈现典型的间歇式周期性波动。

三、中国城镇居民间歇式周期性波动消费行为假说的实证检验

按照前面假说的内容,可以将个体的生命周期分成八大阶段,每一阶段的消费、收入、阶段末的储蓄值分别为 c_i 、 y_i 及 s_i ,其中 $i=1,2,\dots,8$;个体消费者的初始财富为 W_0 ;无风险利率(储蓄利率)为 r_f ;贴现率为 r 。个体消费者最优化跨期效用表示为: $\max U = U(c_1, c_2, \dots, c_8)$ 。满足: $\sum_{i=1}^8 \frac{1}{(1+r)^i} c_i + \sum_{i=1}^8 \frac{1}{(1+r_f)^i} s_i = \sum_{i=1}^8 \frac{1}{(1+r)^i} y_i + W_0$ 。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消费者最佳的消费路径就等价于规划:

$$\max_{c_i, \lambda} L = U(c_1, c_2, \dots, c_8) + \lambda \left(\sum_{i=1}^8 \frac{1}{(1+r)^i} c_i + \sum_{i=1}^8 \frac{1}{(1+r_f)^i} s_i - \sum_{i=1}^8 \frac{1}{(1+r)^i} y_i + W_0 \right)$$

个体消费者在各个阶段内有着不同的消费与储蓄预期,但本质上,八个阶段每两阶段是对应的,即当期的消费小于收入,进行储蓄是为了下期的消费大于收入而准备。因此,每两个阶段事实上是一个整体,个体的生命周期可以看作是两个阶段为一个特征的波浪式消费过程。社会是由个体所构成的整体,社会中的消费也就表现为这种阶段式的消费模式。同时,相邻阶段外的其他阶段间联系较小,前一阶段整体的储蓄可以认为是当期阶段的初始财富,因此,为了分析问题的简化,可以把个体消费者的最优化消费转化为两个离散阶段,即当期与未来期^①,那么消费最优化过程为: $\max_{c_1, c_2} U = U_1 + \beta U_2$ 。满足预算约束: $c_1 + s_1 = W_0(1+r_f) + y_1$, $c_2 + s_2 = s_1(1+r_f) + y_2$ 。由于个体消费效用是实际所得到的消费品的函数,因此,效用函数应具有如下形式: $U_i = U_i(c_i, \frac{p_i}{p_{i-1}})$ 。其中: $\frac{\partial U_i}{\partial c_i} > 0$, $\frac{\partial U_i}{\partial (p_i/p_{i-1})} < 0$, $i=1,2$ 。消去中间参数 s_1 ,可以把上述的两个预算约束条件转化为一个包含两个时期的约束条件:

$$c_1 + \frac{1}{(1+r)} c_2 + \frac{1}{(1+r)} s_2 = y_1 + W_0(1+r_f) + \frac{1}{(1+r)} y_2$$

另一方面,从效用函数的性质可知,若效用与消费间存在着单调递增关系,那么,任何与消费间存在着同样性质的效用函数都能表达这种关系。^{[4]99-123}进一步,考虑现实消费数据与其他因素间的关系,假设效用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U_i = (\frac{p_i}{p_0})^{-1} \log c_i, i=1,2$ 。利用消费最优化的拉格朗日一阶条件,可得消费函数的一般形式如下:

$$c_i = c_i \left(\frac{p_0}{p_i}, y_1, \frac{1}{(1+r)}, r_f, W_0, s_2 \right), r = 1, 2$$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只是以个人行为为基础的微观个体消费行为分析。

① 对效用函数的二次离散划分,国内学者有一定的分析与论述,如参考文献[2-3]。

如果所有居民的效用函数和所面对的约束条件都相同,从宏观上来看,居民整体的消费函数也可能是个体微观经济行为的放大,也即意味着社会整体上也表现为波浪般的间歇式消费行为。基于这种考虑,根据中国国情所选出的中国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消费函数也具有如下形式:

$$C = C(P, P_0, \frac{1}{1+r}, r_f, W_0, S)$$

在进行数据检验时,通货膨胀率利用历年的价格指数,收入、储蓄、价格、无风险利率等都是利用《197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样本期为1978—2005年。考虑函数的一致性及各个变量间实际数据值,统计检验时一致选用对数线性形式,根据样本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可得如下模型:

$$\log(C_t) = -3.00 + 0.53\log y_t + 0.52\log y_{t-1} + 0.64\log p_t^e - 0.01\log i - 0.06\log S_{t-1}$$

D. W = 1.87, R² = 0.999, 模型的各式系数 T 值都显著大于 2。

其中: $C_t, y_t, y_{t-1}, p_t^e, i, S_{t-1}$ 分别表示当期消费、当期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居民预期通货膨胀率、无风险利率、上期的居民储蓄。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在没有对数据进行任何修正的情况下,得到 D. W = 1.87、R² = 0.999 的模型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也满足要求,即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上期收入、通货膨胀率成正相关,而与利率、储蓄成负相关。由于上期收入与上期储蓄都包括在二阶段分析中当期的财富中,也就意味着二者的加总即弹性系数大约为 0.46,正好反映了理论模型中所要说明的问题。

从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研究中可以得出,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存在着间歇式周期性行为,而这种行为正是由于中国的独特文化背景,加之在体制变迁的动态环境中促成了中国城镇居民独有的消费行为特征。

四、基本结论

本文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所提出的我国城镇居民间歇式周期性波动的消费行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存在明显的间歇式周期性波动特征,这一特征是由固有文化产生而在动态变化的社会经济中促成的中国居民独特的消费安排,这种消费安排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我国政府所制定的拉动内需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为保证我国启动消费政策的有效性,有必要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以使居民消费行为得以矫正:1) 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包括失业救济、养老、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消费者当期消费的后顾之忧。2) 大力推广消费信贷制度,扩大消费信贷规模,促进我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3) 倡导新的消费理念,矫正消费者传统的落后的思维模式,引导个人消费行为走向理性化。4) 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和决策规则,确保整个经济活动的连续性而不是间断性。5) 加大收入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霍利斯·钱纳里,莫伊斯·赛尔昆. 发展的型式:1950—1970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 [2] 余永定,李军. 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 [J]. 中国社会科学,2000 (1).
- [3] 叶海云. 试论流动性约束、短视行为与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关系 [J]. 经济研究,2000 (11).
- [4] 哈里·瓦里安. 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赵东奎]